

“战争动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综述

温 艳

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有关抗战动员的研究成果相对分散,尚待深入研究。2019年6月15—16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战争动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会议遴选出30篇论文,并邀请多名专家对论文进行点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等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60余名学者与会。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在开幕式上指出:战争动员的研究已不是军事史研究的附属,而是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战时经济格局、民众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的主题演讲《数字档案的进步与历史研究的发展》,重点阐述了数字档案的国际共享对推动抗战史研究及国际史学的重要意义。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国民政府的战争总动员、中共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国统区的经济与社会动员、基层动员与社会秩序、日本与沦陷区的动员等主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一、国民政府的动员

战争动员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总动员?动员的效果如何?本场讨论主要围绕国民政府全民动员进行了深入探讨。

廖利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动员体制的筹划》认为1934年及1935年国民政府相关人士赴欧洲考察后,在吸收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的战争动员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总动员”的理念,1942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和国家总动员会议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战争动员体制的最终确立。

张艳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的《浅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的计划与实施》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国民经济动员,但因动员过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战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成效。杨俊(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论抗战经济总动员政策的确立》则认为,全面抗战之前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动员而非建设,因此国民党经济动员的开展并非如张艳萍认为得那般迟缓。

张智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抗战时期国家总动员会议的创立与运作》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作为管理国家总动员事项的最高统制机构,但因战时物价急速上涨、物资短缺、管理困难,其物价管制职能逐渐向经济管制职能偏移。

张龙平(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动员:基于国际劳工大会的观察》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利用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的机会进行广泛动员,提出援华制日是抗战时期中国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的特点,但同时国际劳工组织的制度限制也影响了援华制日的实质效果。

吴启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抗战建国”:抗战、建国》一文认为,正是在抗日御侮这一前提下,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加速,中华民族的国族构建认同感增强。参会学者指出,抗战时期的族群动员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妥协来争取他们对抗战和国族认同。在讨论中,王建朗、高士华、张瑞德等从国外的理论和战争实践,以及现代化“有机体理论”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抗战建国问题,认为中华民族在抗日御侮过程中形成共同体,是国族构建的重要因素。

二、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动员与根据地建设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近年来成果颇丰。本次研讨会关于根据地的组织与动员主要涉及群众动员、经济动员、军事动员、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等,同时对中共在城市的管理与动员、医疗卫生、知识分子动员、报纸与读者动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汪效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的《组织与动员: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的生长逻辑》以华中根据地为例,探讨中共如何通过组织群众团体来实现“组织人民的大多数”,认为该方法是根据地民众动员的最有效手段。

李瑞峰(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的《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与参军动员——以榆社县为例》论述了太行根据地榆社县如何把群众运动与参军动员有效结合的问题,认为中共将军事动员与减租斗争、反贪污斗争、反恶霸斗争等群众斗争相结合,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方针,党内党外严密的组织动员为依托,完善的拥军优抗政策为保障的动员体系。

王富聪(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的《抗战时期中共城工部门对城市工作的动员研究——以晋察冀、山东、晋绥根据地城工部门为中心考察》主要关注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城市的动员,认为1940年后,各个根据地开始成立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向敌后城市派遣干部,对城市工作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动员工作,既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也为抗战胜利后夺取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皮国立(台湾中原大学)的《抗战时的群众卫生与政治动员:以陕甘宁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医药政策为例》关注根据地如何通过改善医疗,发扬传统的中医,从而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动员,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把发展中医作为动员民众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实行中西医结合,把中西医更多纳入政治决策,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从而有效地组织了群众。

董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重庆〈新华日报〉及其读者群研究》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如何利用《新华日报》对读者进行宣传动员。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形成以学生、工人、公务员为主体,遍布社会各界的读者群体,在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上,加强报纸影响社会的深度和力度,对读者群体进行有效的动员。

吴云峰(黄山学院)的《淮北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征收中的“反隐瞒”斗争》提出,淮北根据地党组织在征收公粮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措施逐步减少了农民对土地及收获物的瞒报现象,保证了救国公粮的顺利征收。

郝昭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消灭赵保原:抗战时期中共在胶东的崛起》,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发展,认为中共在1946年6月胶县战役中消灭赵保原对山东政局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宋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灭敌人耳目”: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通过“打狗运动”这个“交汇点”,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共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

三、国统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基层动员与建设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了持续抗战,在国统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动员。本次会议关于国统区的动员主题主要涉及捐献运动、粮食与能源动员、青年与教育动员等。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国内民众、海外华侨积极参与捐献运动,是支援抗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林桶法(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的《献机运动的形塑及捐献运动的问题》考察了抗战时期捐献运动的由来与领袖形象的塑造。他认为,1936年国民政府以为蒋介石祝寿为名开展捐献飞机的运动,民众逐渐被动员起来。在此过程中,蒋介石的形象和权威得到刻意的塑造。

王荣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行业变迁、统制经济及粮食动员——战时国民政府对重庆机制面粉行业的管控》以抗战时期的重庆面粉业为例,探讨了国民政府对粮食的管控与动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宏观调控,而面粉统制则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本次会议论文还涉及中国远征军和知识青年从军的问题。杨维真(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的《中国远征军与战时云南(1942—1945)》探讨了中国远征军与战时云南的关系,以及云南对中国远征军的支援与贡献。文章认为这一时期远征军司令部与云南高层保持了友好关系,使给养、驻防都获得了可靠保障,有力地支持了对日反攻作战。陈英杰(台湾宏国德霖科技大学)的《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讨论了抗战时期知识青年被动员从军的问题。他认为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就开始思考如何组训青年。抗战后期,蒋介石把计划付诸实施。知识分子从军是中国在抗战后期面对存亡危机的一次大规模动员,但国民政府付出的成本也很高。

项浩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沦陷前丰县的抗战动员与地方秩序:以〈黄体润日记〉为中心》考察了在徐州沦陷前,徐州所属县如何进行抗战动员与维护地方秩序。通过黄体润日记可以看到,县级政府在基层动员方面至为关键,一方面征募物质、抽调壮丁,募集救国公债,支持前线抗战,另一方面还要剿匪、维持地方治安。

梁善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燃煤之急与能源动员:抗战时期西安“煤荒”之演化与政府因应》考察了能源方面的动员,认为陕西省政府与中央通过统制煤炭运销推动供给结构改革,保障了煤炭供给的稳定。

赵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以华侨之名:华南抗战初期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1938—1940)》认为抗战初期的东江华侨服务团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却是中共将侨务从海外推展至国内、结合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的全新产物。

谢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与政治动员研究》考察了抗战时期新疆的政治动员,认为社会教育在动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夏巨富(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的《国难中的“地税救国”:战时土地税的实施及其转轨(1937—1945)》认为随着战时财政危机日趋加剧,国民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土地税法令。战时地税的实施最终在国难中实践了“地税救国”的初衷。

四、沦陷区的动员

近年关于沦陷区的研究也是抗战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对此,本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日本的视角来讨论战争动员,涉及日本的防疫体系、粮食统制及日本在华的宣抚班等问题;二是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动员等相关问题。

冯钰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全面抗战初期日军的防疫体系——基于日本军方档案的研究》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日军在沦陷区防疫体系的构建。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建立了一套防疫体系,但建立这一体系的根本目的不是保障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而是避免传染病疫情波及日军。

季泓旭(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总体战体制下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经济控制》认为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完全移植了日本“国家总体战”体制,是日本“国防国家”体制在中国东北的移植与扩展。

抗战时期,日本的宣抚班可以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条战线。吴婉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糖衣与良药下的炮弹:日本宣抚班在华沦陷区的战争宣传》主要考察了宣抚班如何在沦陷区开展宣传活动,并实现侵华目标。认为日本在沦陷区通过开展民众运动,制造有利于日本的舆论基础,以此维护和巩固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而宣抚班则充当了重要帮凶。

沦陷区的日伪基层动员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话题。郭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汪伪政府“清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探讨了汪伪政权在“清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问题,认为这种宣传动员因其反动性、欺骗性、矛盾性,损害了民众利益,再加上中共的反“清乡”斗争,最终归于失败。

赵秀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青岛沦陷初期日伪对民众的动员活动——以〈青岛新民报〉为中心的考察》,通过《青岛新民报》的报道,考察了青岛沦陷后,日伪如何对民众进行宣传动员。认为日伪的动员对象非常广泛,大部分民众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动员活动之中。

大野太干(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从“满洲国”的粮食统制看“动员”》,认为日本把伪满洲国的粮食特别是大豆作为获取外汇的重要手段,分析了粮食动员与战争的关系。

此外还有关于战争与性别的研究。柯惠铃(台湾中原大学通识中心)的《战争、记忆与性别:女性口述访问记录中的抗战经验》通过考察女性群体的记忆,展现了战争中除了军事以外的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层面,对于了解战争时期的一般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五、综合讨论

本次会议的一个创新之处是在专题讨论之后又专门设置了综合讨论。综合讨论会上,学者们对战争动员研究各陈所见。林桶法倡导从比较的角度去思考历史,强调时间轴和空间轴的观念。杨维真强调了动员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认为要重视区域的差异性,并对战争动员中的精神动员、妇女记忆等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士华认为目前学界的研究和本次会议内容还是以战争动员和社会动员居多,而其他方面动员的研究相对薄弱,建议以后继续组织开展这类讨论。李金铮希望青年学者能秉承求真求实的态度,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时空问题。臧运祜希望研究者在选题视野、区域性、动员的理论性阐述等方面能继续深入探讨。柯惠铃希望尝试从妇女史的角度来理解战争的多面性,并对历史的书写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波多野澄雄提出了战前和战后的连续性问题以及战争对日本民众的影响,并解释了与会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何日本的战争动员体制建立时间较晚?这是因为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初期采用的是速战速决的战略,故而并未进行全方位的动员,直到初期的战略失败后,才开始建立全民动员体制。王建朗和李学通就历史的“碎片化”、史实重建与价值判断等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

[作者温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来特)

The CPC's Responses to the Betrayal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adres in North China Resistance Base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Yang Dong, Li Gelin (51)

The cruelt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well known, so it is inevitable for any Party to have a minority of defectors and traitors. However, the betrayal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of the CPC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gions and groups. The defections of a small number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to the enemy were, of cours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sts and even contrary to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munists. Therefore, the CPC paid great attentions to th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defectors. In the contradiction and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defecting to enemy" was almost the expression of mutual recriminations of both sides. The Kuomintang accused the CPC from the angl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s rule, while the CPC refuted i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Because the CPC timely made correct contingency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deal with problems, the defection of a few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did not aff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PC's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CPC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spirit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Kuomintang's Works of Arming Civilians in Guangdong under "Military-Civilian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 People's Anti-Japan and Self-defense Corps Li Hao (68)

"Showa Trading Company"—A Company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War Guo Xunchun (80)

"War! There is War Everywhere!"—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Goebbels Diary Peter Harmsen (93)

The complete diary of Joseph Goebbels, the Nazi German Propaganda Minister, was only used by historians in recent years. Previous important articles and books on Germa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ave failed to use this historical material.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problem: to what extent the pub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in Goebbels diary will correct the past views about the extent of Germany's involvement in the Far East crisis. The articl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itler's role in decision-making in 1937, and gives concrete evidence that the German dictator turned to pro-Japanese position, which was actually earlier than previous speculation. In addition, Goebbels diary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Hitler's view of East Asia by Nazi ideology was perhaps far more beyond previous estimates.

Paper and War: Paper Shortage and the Social Respons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u Xuming (103)

The Studies on Opium Invasion Policies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War Wang Meiping (120)

Commentary o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by Arthur N. Young Wu Jingping (132)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War Mobilization and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n Yan (138)

A Summary of the Sino-Japane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rtime Mobilization in East Asian—Impact and Heritage" Gao Shihua (142)

A Summary of "The Fourth High-level Forum on the Study of the Great Rear Area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Gao Xiaobo (147)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Stud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or Seventy Years" Zhang Yan, Yan Yong (152)

General Table of Contents,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2019* (157)